

※研究動態※

《全宋文》筆談

歷代文學總集的整理工作，清代完成了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等，民國時期編輯出版的有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新中國成立以來，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、《全明詞》、《全清詞》、《全元散曲》、《全明散曲》、《全清散曲》陸續出版，編輯總集成一股熱潮。一九八三年起，在中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的推動之下，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負責編輯《全宋文》，至二〇〇六年八月全部出版，計有三六〇冊，收文一七八二九二篇，這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文學總集。四川大學古籍所把《全宋文》出版後學者對該書的評論，蒐集編成〈《全宋文》筆談〉，對想了解《全宋文》的編輯過程，和該書對研究宋學之貢獻的學者，應有相當的幫助。二〇〇六年七月為執行「晚清經學研究計畫」之子計畫「晚清四川地區的經學研究」，文哲所和國內各大學研究經學的同道，赴四川成都考察，與四川大學古籍所合開「蜀學研究座談會」，舒大剛所長報告《全宋文》的編輯出版過程，筆者希望舒先生能提供相關資料，刊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中，讓海外學者能對《全宋文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，舒先生提供了本篇。

林慶彰 謹識

2007. 4. 10

整理宋代文獻，傳承歷史文化 ——在「《全宋文》首發式」開幕式上的發言

謝和平*

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高峰時期，其所形成的文化璀璨恢宏、獨具風韻，對後世產生了十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。在當時的文化廊苑中，各體文學的發展都取得了重要成就，前人有「秦以下文，莫盛於宋」的說法。蜚聲文壇的唐宋八大家，宋居其六。宋代有別集流傳者約六百餘家，加之單篇散文流傳的作者將逾萬人。這是前人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，是我們從事現代文化建設的寶貴資料，在世界上也影響十分深遠。編纂《全宋文》，將這些資料收集整理出來，傳承下去，是一項繼往開來、傳承文化、再造文明的宏大工程。這項工程由我們四川大學的學人來完成，這是我們的榮幸和驕傲。

四川大學是國家布局在我國西部的高水準研究型綜合大學，由原四川大學、原成都科技大學、原華西醫科大學三所全國重點大學合併而成。一百一十年來，四川大學一直努力自覺地擔負起高素質創新人才培養、科學研究、先進文化輻射源的神聖職責，彙聚、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國家棟樑和社會精英，完成了許多國家重點科研的項目，為國家的經濟建設、社會進步和文化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。尤其是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面，我校許多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們，在優秀傳統中華文化的總結與傳承、在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的繁榮與弘揚的過程中，更是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令人矚目的成績。

自一九八三年起，在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」的大力支持下，我校承擔了教育部「七五」、「八五」規畫重大專案——《全宋文》。對宋代文獻的全面收集、深度挖掘和仔細整理，歷時二十餘年，日前終於順利完成並出版發行。《全宋文》是目前最大的斷代文章總集，收集宋文十七萬餘篇，文字超過一億字，內容涉及宋代文、史、哲、經、法、科技、醫藥、宗教、藝術等各個領域，

* 謝和平，四川大學校長。

是研究宋代文化最為齊全的寶貴資料。因此，這套書的出版，是我國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它不僅是學術界的驕傲，也是出版界的盛事。在此，我謹代表四川大學，向所有參與該工程的編纂者和工作者們，以及出版社，表示衷心地感謝和崇高的敬意！

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

張立文*

《全宋文》作為迄今為止我國最大的斷代文章總集的出版，我心情十分激動，感慨萬千。我從事宋、明、清思想、哲學研究四十六年多，為找資料的艱苦是現代年輕人所不能體會的。《全宋文》的出版，為我們的宋代乃至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，打開了方便之門，把作為中華民族思想學術達到「造極」之時的政治、思想、經濟、文化、哲學、科技、史學、文學、倫理學展現於世。《全宋文》的巨大作用，猶如九層之臺，起於壘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上述的研究，必須有賴於壘土、足下的基礎開始，無此，我們的研究便是無源之水，無本之木。因此，我祝賀它的出版。

看了《全宋文》的資料，我非常感動，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。我想了兩句話，其實是改了兩句話：「致廣大盡精微，綜羅宋文；極高明道中庸，探賾理學。」我對這句話做出現代的詮釋，同時也是《全宋文》的特點：

- 一、廣：跑遍全國各大圖書館，查閱上萬種圖書資料，包括孤本、珍本、碑帖、地下出土的石刻碑本，收錄全部宋代的單篇散文、駢文、詩詞以外的韻文，其中，詔文是《宋大詔令集》的十倍。
- 二、大：收文二十萬篇，作者逾萬人，全書三六〇冊，一億字，是《全唐文》的十倍，成為最齊全的宋文文章淵海、中國最大的斷代全文總集。
- 三、精：每位宋文作者撰有小傳，一萬個小傳，並注明所據資料，除注正式出處外，並注明觀於何書，有的達數十處，可見其精微。

* 張立文，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。

四、高：起點高、視角高，能對中華民族文化發展最高峰的宋代，做出高水準、高質量的蒐集，為研究理學的「形而上之謂道」的「道」提供豐富的資源。

五、中庸：宋明理學把《禮記》中的兩篇〈大學〉、〈中庸〉與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組成為《四書》。為宋明理學找到依傍的詮釋文本；為中華思想的轉化提出理學；為安頓儒、釋、道三家文化的融貫和合為理學，而開出理學的新方向、新學風。

我再次衷心地祝賀《全宋文》的出版，它的出版，必將對學界產生巨大的影響。

從《全宋文》的「全」看其學術價值

劉 琳*

四川大學古籍所的二十多位同仁從一九八五年開始編纂《全宋文》，經過二十一年，終於全部出版了。本書共八三四五卷，收入宋代的單篇文章一七八二九二篇，幾乎為《全唐文》的九倍（《全唐文》收文二〇〇二五篇）；包含作者九一七六人，為《全唐文》的三倍（《全唐文》所收作者三〇三五人）；總字數近一億，為《全唐文》的十倍。這是中國迄今最大的一部文章總集，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巨大的學術工程，它為研究中國古代，特別是宋代的歷史文化建立了一座資料庫。

《全宋文》同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、《全唐文》等書一樣，是屬於「義取全備，巨細兼收」的全編性斷代總集。其任務在於蒐羅某一歷史階段所有現存的單篇文章，按一定的體例加以整理編纂，從而為學術研究者和廣大讀者提供查找、閱讀與研究的方便。其宗旨首先在於「全」，全不全是衡量這類總集質量的第一條標準。所謂「所有現存單篇文章」包括以下四個方面：一是現存別集之文，即集內文；二是別集未收之文，即集外文；三是無集傳世的作者之文；四是無名氏之文。現在出版的《全宋文》還只是有名氏作者之文，至於無名氏之文已經收集，但還有待繼續整理出版，因此這裏只就前三個方面，通過一些統計數字，說明《全宋

* 劉 琳，四川大學古籍所教授。

文》做得怎樣，取得怎樣的成果，還有些甚麼缺陷。作為《全宋文》的主編之一，這也是向讀者的一個交代。

據目前所知，宋代有詩文詞別集留存至今的作家約七百餘人，其中別集合文者三八四人。這三八四位作家，《全宋文》已收得其別集者三八二家，失收二家。所收的集內文達十一萬四千餘篇，占全書收文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，即將近三分之二，成為全書的主要組成部分。可以說《全宋文》在蒐羅別集方面已經接近於「全」，這是得之不易的結果。

三八二家的別集有數千種版本，而且有的作家還不止一種別集，如何正確選擇底本是關乎全書質量的一個重要問題。《全宋文》所收別集底本都是選擇足本、善本、清代以來的精校本，其中還有一些是孤本。不同版本所收之文時有不同，同一作家的諸種別集所收文更是不盡相同或完全不同，而且有時文同而題不同，題同而文不同，需要經過仔細核對，去除重複，互相補足。《全宋文》在這方面也做了努力，儘量爭取所收集內文不漏或少漏。儘管由於種種主觀的、客觀的原因，沒能完全做到，但《全宋文》蒐羅別集的巨大成績是不可否認的。

上述三百八十多位作家雖有別集傳世，但他們仍有不少文章未曾收入集內，蒐輯集外佚文是《全宋文》的另一項重要任務。《全宋文》輯出之集外文達七七六八篇。其中三一四人都有數量不等的集外佚文，占有集作家三八四人的百分之八十二，僅七十人未有集外文。集外文在十篇以上者一六三人，在一百篇以上者十一人。有的集子本是前人輯佚所成，或經陸續增補，但《全宋文》後來居上，所輯更為完備。還有的作家，現存的集子為後人所輯，遺漏甚多，《全宋文》為之重輯。有了這七千多篇集外文的輯佚，以後要整理宋人別集，就省事多了，只要把《全宋文》與《全宋詩》、《全宋詞》三書中同一作家的作品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得到這個作家迄今最完整的集子。近幾年四川大學古籍所正是憑藉《全宋文》的輯佚成果，整理出《范仲淹全集》、《黃庭堅全集》、《張栻全集》、《朱熹集》。

別集的蒐羅和集外文的輯佚還不是《全宋文》收集宋文工作中最困難的事，因為有集子傳到今天的宋代作家畢竟還不到四百人，收集他們的集子和集外文目標比較明確，範圍相對集中；而其餘有文章傳世，但文集已經失傳或本無文集的作者要多得多，而且事先很難知道哪些人有文傳世，什麼地方有他們的文章，只能根據我們有限的文史知識，劃定大範圍，採取大網撈魚、沙裏淘金的方式去進行普查。為此，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，川大古籍所全體人員傾巢出動，到北京圖書館

(今國家圖書館)、科學院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、四川省圖書館、川大圖書館等全國主要圖書館查找別集以外的宋文，在極艱苦的條件下，用了兩年多時間進行登記、複印、手抄。以後又陸續進行了多次補查。總計查閱的文獻近萬種，至今有案可查者即有收入《中國叢書綜錄》中的圖書約四千種，單刻本的一般圖書一千六百餘種，地方志二千餘種，佛藏之書數百種，還有碑刻拓片千餘種。登記的宋文（未去重複）達數十萬篇。這是任何個人的力量所無法做到的。

正是這種廣泛的普查為《全宋文》的輯佚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經過整理，除了收得上述的集外佚文七千多篇外，有文無集的作者收入《全宋文》者達到八七九二人，占全書所收作者總數九一七六人的百分之九十五點八；文五五九〇三篇，占全書收文總數一七八二九二篇的百分之三十一。若加上集外佚文七七六八篇，則《全宋文》收得的佚文達六三六七一篇，占全書收文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七，即三分之一以上。其中有一五六位作者所收佚文在二卷以上，佚文最多的黃震達到三十二卷。

以上的統計數字說明，《全宋文》沒有辜負它的這個「全」字。絕對的全是不可能的，但可以說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七、八，已經接近於「全」。而這個「全」字正是它的價值所在。因為「全」，讀者可以比較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，學者可以比較方便地利用它做很多事，進行學術研究。《全宋文》所收文，就其內容而言，涉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、教育、學術、科技、社會風俗、地理等等領域，幾乎無所不包，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諸多學科的研究者都可以從中獲取有用的資料。

當然，《全宋文》還有很多缺陷，有待補充和修正，而且它的任務也只是提供資料和線索，並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專門研究。

宋文淵海，學林大觀

方 健*

歷經二十年的爬梳剔抉、蒐輯校點，歷經整理、出版過程中的坎坷曲折，備受

* 方 健，上海師範大學、河北大學兼任教授，杭州社會科學院兼任研究員。

學界關注的煌煌巨編——《全宋文》已正式出版發行，這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大盛舉，古籍整理事業的豐碩成果。《全宋文》刊行，與已出版的《全宋詩》、《全宋詞》和正在陸續出版的《全宋筆記》（已出二輯）一起，共同構建了宋代比較完備的資料庫的主體部分。這也是最早合璧的，按現代學術規範整理而成的斷代詩、詞、文總集。如果加上《長編》、《宋史》等已正式出版史部書的校點本，及正在整理的《宋會要輯稿》、《文獻通考》等宋代資料書，必將對宋代文、史、哲的研究產生歷久而彌遠的影響。

全書收文十七萬八千餘篇，作者近萬人，字數約一億，分裝三六〇冊。不失為迄今篇幅最大、字數最多的斷代文章總集，也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已完成規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專案。這部花二十年時間精心打造的煌煌巨編，必將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，並將以便於學者閱讀、使用而產生深遠的社會效應。

作為宋學或宋代文明傳承的載體之一，《全宋文》最重要的貢獻在於「網羅散佚」。《全宋文》集萬種書為一書，將兩宋的單篇散文、駢文及詩詞以外的韻文彙為一編，可省卻讀者無數翻檢之勞。宋人別集今存世者不過五百餘種（方按：另有不含文詩、詞集約二百餘種，合計約八百種左右），《全宋文》收作者近萬人，這意味著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宋人之文靠輯佚所得，多零篇散章，又要細加比對，校勘文字。以總字數近一億論，約有半數得之於輯佚，可想見工作量之大。其中許多是首次刊行的可貴資料。自陳寅恪先生提出以詩證史、詩文互證的治學方法以來，學者無不奉為圭臬。其充分掌握研究課題所涉的全部資料，是治宋史者的首要之義。捨此，即難為無米之炊。如果說治政治史的學者，可從史部書中找到主要相關資料的話，那麼，《全宋文》提供給治宋代經濟史、文化史、軍事史、法制史、科技史、宗教史、科舉制度史、教育史等學者的信息量，將是史部書無法比擬的。對宋史學者而言，《全宋文》猶如含金量極高的富礦，有待深入開掘，開卷即必有所獲。

研究宋代經濟史的學者，往往因南宋中後期的史料奇缺而感到困惑。北宋及南宋初的史料，往往可從《宋會要輯稿》、《長編》、《通考》、《宋史》、《繫年要錄》、《朝野雜記》等史籍中獲得，筆者在撰寫《南宋農業史》、《商業史》的過程中，就從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部叢刊》等書所收南宋人別集中，尋檢得許多珍貴史料，從而可以斷言，從《全宋文》所收的佚文中所獲必更多。

宋代人物之盛亦歷朝罕見。龔延明教授等編《宋代登科錄》，據說收四萬餘

人。臺灣王德毅先生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收二萬二千餘人，《全宋文》所收作者為九千七百餘人，其中有許多不見於上述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李國玲女士編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》已補近萬人。《全宋文》近萬人的作者小傳提供了宋代人物研究的無數可貴資料。曾棗莊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文學家大辭典·宋代卷》（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出版）收二千五百餘人，已逾一百萬字，此或可視作《全宋文》的副產品。如果以《全宋文·小傳》為基礎，編一部《宋代人物大辭典》，則無疑將是一部更為有用的工具書。《全宋文》的功能、作用、價值難以盡述，以上僅據已出五十冊翻檢使用所憶及而概略言之。

早在近二十年前，繆鉞先生在〈全宋文序〉中就頗有預見性地談到，是書編纂有「普查蒐採之難、校勘辨訂之難、分類編序之難、制訂條例之難」。但《全宋文》基本上達到了繆先生的期許，即其「蒐採之廣博、體例之謹嚴、抉擇之審慎、編次之合法，或能較《全唐文》略勝一籌」。《全宋文》在總結前人編纂總集的得失後，有周密的籌劃和設計，其詳請參見是書卷首〈前言〉和〈凡例〉。其所附〈作者索引〉等，尤便讀者，完全是按現代學術要求而編纂的成功範例。也是集體編修總集最為圓滿的嘗試之一。

《全宋文》在發凡起例之時，就懸鵠甚高，在巴蜀版〈前言〉中提出：「收文力求不重、不漏、不誤，體例力求謹嚴，作者和作者小傳力求不出差錯，版本力求選擇足本、善本，校勘力求精審，標點力求準確。」其中每一條都不容易完全做到。從《全宋文》已出的五十冊看，「取捨不當、張冠李戴、漏收〔誤〕收、編排失當、體例不一」¹等情形，不同程度地存在。學者在使用中，也發現並提出了一些問題。難能可貴的是，《全宋文》的編者趁這次推出新版的機遇，對前五十冊（新版分裝一百冊）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訂。尤其是兩位主編，不僅制定了體大思精的編纂總則和操作性很強的工作規範，還率先垂範，躬親實踐；不僅承擔了一定量的點校任務，還嚴格把關，一一審稿。甚至還為外請學者的點校稿「打工」，拾遺糾謬。這與某些總集的編者只掛名，不參編，不審稿，只知撈取個人名利；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和數以萬計的舛誤，卻諱疾忌醫，拒絕補訂，甚至強詞奪理，倒打一耙的態度，其境界實有天壤之別。

據筆者所知，《全宋文》在十二年前已編竣。令我擔心的是，後一三〇冊（即

¹ 曾棗莊：〈論全宋文〉，《宋代文學與宋代文化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389。

新版的一〇一至三六〇冊）不知是否亦如前五十冊一樣做過修訂，但願這是杞人之憂。作為始終關心《全宋文》出版，又較早使用其書前五十冊的讀者，亟盼《全宋文》廣泛汲取學界的訂補意見，儘快著手《全宋文補正》的編輯。

另外，就是小傳的體例雖善，編寫難度卻極大，仍留有不少未盡人意之處。在目前的資料條件和技術支援下，完全可以，也應該寫得更好。

川大古籍所在編《全宋文》的過程中，形成了一支老、中、青相結合的學術團隊，出了一大批令人矚目的相關成果，同時也闖出一條自費出版學術著作的新路子。川大古籍所堪稱出人才、出成果、出經驗，已成為海內外收藏宋代資料（包括電子版）最富的宋學研究中心之一，該所之學術潛力正方興未艾。應該說，這條漫遠而燦爛的學術之路，是從《全宋文》編纂開始起步的。

《全宋文》與宋代思想家研究

郭 齊 *

《全宋文》是大型斷代文章總集，其基本性質是一部宋代百科資料彙編。在當今整理研究方法現代化的背景下，這樣一部資料彙編還有沒有價值？有怎樣的價值？

我們知道，資料彙編的主要功能是方便檢索和學術指南，本質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研究者進行前期資料瀏覽和收集篩選。隨著數位化圖書館、電子全文檢索的興起和運用，文獻編纂學中的一些傳統的門類，如人名索引、地名索引、書名索引、篇名索引、字頭索引、詞句索引等工具書的編纂已經或將要退出歷史舞臺。但由於迄今為止所能提供的檢索，基本上也還僅限於機械檢索，而不是文獻內容的智慧檢索，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，資料彙編還會長期存在，並體現出它不可替代——也許永遠不可替代的巨大價值。它可以針對不同的用途，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，進行初步識別和篩選，剔除垃圾資訊，縮小閱讀範圍，提供線索，指示門徑，在極大程度上把研究者從大海撈針、皓首窮經的困境中解放出來，從而更多

* 郭 齊，四川大學古籍所研究員。

地投入理論思維。對各種專題資料彙編的需要是無窮的，文獻編纂學者要做的工作也是無窮的。

作為百科資料彙編，《全宋文》的價值是多方面的。這裏僅以朱熹為例，談談它在宋代思想家研究方面所發揮的巨大作用。

《全宋文》編纂初期，曾動員數十名專業人員，花費幾年時間，進行了大規模的資料普查，共查閱國內外公私藏書一兩萬種，輯得大量珍貴資料。這是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做到的。因此，輯佚是《全宋文》最重要的貢獻之一。在整理《朱熹集》時，我們以《全宋文》普查的成果為基礎，共收得朱熹佚文一二九篇，編為三卷；尚待進一步考證的佚文一〇五篇，編為二卷，可謂富矣！

在所輯得的佚文中，有不少具有重要價值。如《全宋文》從《續藏經》中普查到了朱熹〈與開善謙禪師書〉和〈祭開善謙禪師文〉兩篇佚文，為研究朱熹早年學禪問題提供了重要佐證。通過我們〈棄儒從釋的真實寫照〉、〈朱熹學禪的引路人——道謙生平考〉、〈道謙生平補考〉、〈朱熹道謙交往考〉、〈朱熹宗杲交往考〉、〈朱熹從道謙學禪補證〉等系列論文的研究，在朱熹學禪這一長期知之甚少的重要問題上，就取得了突破，可以說至此，朱熹早年涉獵佛學的細節基本上清楚了。

又如，人所共知，淳熙二年「鵝湖之會」和淳熙十六年「太極之辯」，是朱熹和陸九淵之間最大的兩次學術論爭，結果都是不歡而散。今天留給我們的是，「鵝湖之會」上辛辣的嘲諷和「太極之辯」時聲色俱厲的唇槍舌戰。但《全宋文》所收集的朱熹佚文卻使我們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。這些佚文表明，對陸九淵的意見，朱熹的確作了認真的思考和反省，從而彌補了舊學說的某些缺陷。而公開承認「向來汨濫」、「向來支離」、「道問學處多了，踐履多不及」，也顯示出從善如流的大家風範。這些真相，在以門戶之見剪裁取捨過的朱熹文集等文獻資料中，是很難看到的。這樣的佚文很多，因其內容僅見，因而是不可替代的，其價值可想而知。

《全宋文》普查到的朱熹佚文，在使用之前，當然還必須逐篇進行考證，辨別其真偽。由於普查的範圍廣，同一條資料往往有多個出處，能提供充分的線索，有利於順藤摸瓜，由此及彼，得出可靠的結論。經我們仔細考察，剔除的朱熹偽作數以百計，其中包括在有影響力的報刊上公開發表，或出版過研究專集的稱為「驚現」和價值連城的偽作。除集外文的甄別外，有時還能牽連發現文集集中的偽作。朱熹文集集中的〈三先生論事錄序〉、別集中採自《臨江集》的十首詩，就是在排比普

查資料時發現問題的。前者實為陳亮所作，而後者則為臨江道流偽作。千百年無人置疑的問題，由於《全宋文》的編纂而得以發現和解決。在辨偽學方面，《全宋文》的確功不可沒。

在文字校勘上，《全宋文》更是功勞卓著。僅整理朱熹文時採用的校本之一——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宋本《晦庵先生文集》，即據補今本文集之缺數千字，糾正今本文集之誤近百條，同時提供了豐富的異文，可資研究參考，並為弄清本文作年及其他史實，提供了大量確鑿的依據。此類例子極多，不能一一枚舉。

《全宋文》在朱熹研究中之所以能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，是因為這一浩大的工程具有不可替代性。個人或少數人不可替代，在可以預見的歷史時期內，機器也不可替代。為了這一造福於子孫後代的事業，數十名學者付出了長期艱辛的勞動。隨著它的問世，凡是朱熹的研究者或是想要了解朱熹的人都將從中受益。

《全宋文》對朱熹研究的價值當然不止這些，對宋代思想家研究的價值當然更不止這些，它當然也遠不止對宋代思想家研究才具有重要價值。以上談到的，實在是滄海一粟。儘管這部迄今為止最大的文章總集還存在種種的不足，甚至嚴重的缺點，但相信它一定會以其對民族文化的卓越貢獻而載入史冊，與天地長存！

《全宋文》與《詩經》研究

李冬梅*

《詩經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它與《楚辭》乃先秦文學的兩大瑰寶。同時《詩經》又兼有「詩」與「經」的雙重職能，故其不僅是中國文學之源，亦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淵藪。自漢迄清，《詩經》的注釋、解說論著，層出不窮。宋代是《詩經》研究的重要時期，不僅專著大量湧現，而且單篇論說及序跋亦不在少數。在「疑經惑傳」風氣的指導下，許多單篇文章更是集中地對《詩經》的內容、語言、文字以及《詩序》、《傳》、《箋》等提出新見解。因此，研究《詩經》，在重視專著的同時，更應注意這些單篇文獻。《全宋文》是有宋一代單篇散文、駢文

* 李冬梅，四川大學古籍所博士生。

以及詩詞以外的韻文彙編，是一部完備而又易於檢索的大型斷代文獻。故本文試以《全宋文》所收有關《詩經》類單篇文獻為主，從文獻收集、版本選擇、資料補遺等方面，簡單談談《全宋文》對研究宋人《詩經》學的價值所在。

一、網羅放佚，集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之大成。關於宋代《詩經》學文獻的著述考，除清儒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有比較專門、詳細地考證外，目前亦有四家學人對此作有專門考證。如劉毓慶《歷代詩經著述考（先秦——元代）》（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出版）、周何《詩經著述考》（臺北鼎文書局二〇〇四年出版）、陳文采《兩宋《詩經》著述考》（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二〇〇五年出版）以及郝桂敏《宋代《詩經》文獻研究》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）。不過，這幾部著作除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和劉毓慶《歷代詩經著述考》對宋代《詩經》學的單篇文獻略有著述和考證外，其他三種則均只著錄《詩經》學的專書性著作，這對於有宋一代現存豐富多彩的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來說，無疑是一件憾事。據筆者統計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著錄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甚少，只有六篇，分別為李清臣〈詩論〉二篇、張方平〈詩正變論〉一篇、周紫芝〈騶虞解〉一篇、胡銓〈素冠說〉一篇、范處義〈毛詩明序篇〉一篇。對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略有考證並「酌情列入」的劉毓慶《歷代詩經著述考》，在此基礎上著錄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為二十八篇，其中注明「未見」的有四篇，除去周紫芝〈騶虞解〉、胡銓〈素冠說〉二篇文章實存而誤認為未見外，其著錄的現存單篇文獻共二十六篇，這較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就多出了二十篇。此外，對於號稱收書頗為全面的《四庫全書》而言，其《四庫全書文集篇目分類索引》所收《詩》類文獻除去重複收錄及有目無文者，共收錄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論說之文九十二篇，序跋之文三十二篇，總計一二四篇，可謂是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收錄比較全面之作。然《全宋文》網羅放佚，集萬種書為一書，將兩宋涉及《詩經》學的單篇文獻全數彙錄，較前人又有極大突破。其所收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論說之文為一四六篇，序跋之文三十八篇，共計一八四篇。這相較於前幾部著作所收來說，實為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之集大成。故學人稱《全宋文》是「宋文資料的淵藪」、「宋代文學研究者的資料寶庫」實為不假。

二、精選底本，訂補《詩》學文獻著述錄之缺失。據劉琳、沈治宏《現存宋人著述總錄》著錄，宋代有詩文詞別集留存至今的作家約七百餘人，其中別集含文者三百八十餘人。這三百八十餘人的別集有數千種版本，而且有的作家還不止一種別

集。不同版本的文集所收之文時有不同，同一作者的諸種文集所收文更是不盡相同或完全不同，而且有時文同而題不同或題同而文不同。因此，《全宋文》在版本選擇上所力求的足本、善本以及精校本等，就使《全宋文》在蒐羅宋人別集之文方面更接近於「全」與「善」，並能據此以補其他別集之不足。就《詩經》學文獻來說，《全宋文》中所收廖剛《詩經講義》、周紫芝〈騶虞解〉、胡銓〈素冠說〉就是明顯的例子。廖剛《詩經講義》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曰：「二卷，存。」並考其書載於《高峰文集》中，但未注明具體版本，故劉毓慶《歷代詩經著述考》說：「今翻檢《四庫》本《高峰文集》，未見有《詩經講義》，不知朱氏所據為何本。」於是於此書注曰「未見」。陳文采《兩宋《詩經》著述考》亦云：「《經義考》載是書二卷，曰存，朱彝尊考其書載《高峰文集》中，唯檢今本《高峰文集》並無《詩經講義》。未知何據。蓋是書約成於南宋初年，乃最早以《詩經》為籤題者。」亦將其劃歸入「未見書錄」。郝桂敏《宋代《詩經》文獻研究》書後所附〈宋代《詩經》著述目錄〉也稱：「廖剛《詩經講義》二卷。《經義考》注曰存，今未見。」可見，劉、陳、郝諸位先生均據其所見之廖剛《高峰文集》本言其未收《詩經講義》，遂稱廖氏此文「未見」。不過，今《全宋文》卷三〇〇一至三〇〇四卻明明收有廖剛《詩經講義》四卷。這是因為《全宋文》的編者找到了福建圖書館所藏之明抄本《高峰先生文集》十七卷為底本，並參校清陸芝榮三間草堂抄本《高峰先生文集》十二卷、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本《高峰文集》十二卷。廖剛《詩經講義》即從《高峰先生文集》的十七卷本所得。廖剛《高峰文集》據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為十七卷，現存主要版本有明抄本、清抄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和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本。明抄本為十七卷，清抄本有十七卷和十二卷之分，《四庫全書》本和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本則均為十二卷。在這四種版本中，十七卷本的抄本卷十五、十六、十七即為《詩經講義》，十二卷本的清抄本及《四庫全書》本和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本則未收錄《詩經講義》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云：「是集久無刻本，傳寫多誤，脫字或至數行，無從校補，今亦姑從舊本錄之。」由此可以推知，《四庫全書》所據之十二卷本有可能是一殘缺之本。目前十七卷本流傳不廣，學者多不能寓目，故常以流傳甚廣的十二卷本立說，並據此判斷廖剛《詩經講義》未見。然《全宋文》能旁蒐博采，精選底本，於眾家《詩》學著述考之外，尤能訂補出此文，實是對《詩》學研究的一大貢獻。

另周紫芝〈騶虞解〉和胡銓〈素冠說〉兩篇文章，《經義考》注「存」，《歷

代詩經著述考》云：「未見。」《全宋文》分別據《太倉稊米集》、《南宋文範》和《胡澹庵先生文集》、《廣州人物傳》收〈騶虞解〉和胡銓〈素冠說〉於卷三五二八和四三一八中。其中〈素冠說〉為胡銓以《禮》訓《詩》之文，而〈騶虞解〉所釋詩旨則多遵《詩序》，如云：「其辭《詩》與《序》義相合，坦然明白。」詩篇盡現《序》之所謂「庶類繁殖」、「仁如騶虞則王道成」之義等。詞語訓詁又多依《毛傳》，如釋「騶虞」為「義獸」等。胡銓無《詩》學著述，周紫芝《詩》學著述《毛詩講義》亦早已散佚，現僅賴所存〈自序〉以及〈騶虞解〉以觀其《詩》學思想，故《全宋文》對〈騶虞解〉和〈素冠說〉兩文的收錄，實是對現行之《詩》學著述的有益訂補。

三、白璧微瑕，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之補遺。歷代所編總集，乃「文章之衡鑒，著作之淵藪」。《全宋文》是迄今最大的一部文章總集，所涉傳主九千五百餘人，收入單篇文章一七八二九二篇，規模之大，蒐羅之廣，實屬罕見，而這個「全」字正是《全宋文》的價值所在。不過正如有的先生所說，「絕對的全是不可能的」，只要能接近於「全」，那就是《全宋文》的價值所在了。《全宋文》中所收文獻稍有遺漏，實在所難免。筆者在蒐集宋代《詩經》學文獻資料時，發現現存之宋代《詩經》學單篇文獻還有蘇轍〈詩說〉（見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一六四《穎濱文鈔》）、呂祖謙〈詩說辨疑〉（見《東萊集》別集卷十六）、洪邁〈詩外傳跋〉（見《詩外傳》附）、唐仲友〈詩經發題〉（見《唐氏遺書》）等四篇文章。因其不見於《全宋文》，故將其題名、出處附錄於此，以益學者之探討。

《全宋文》與宋代《春秋》學研究

張尚英*

《全宋文》上承《全唐文》，下接《全元文》，是現存最大的一部斷代文章總集，收錄了九千多名宋人的十七萬多篇各種體例的文章，是現存宋代文獻的淵藪，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巨大寶庫。《全宋文》所收文章的內容涉及文學、藝術、歷

* 張尚英，四川大學古籍所講師。

史、哲學、政治、宗教、經濟、教育、科技、軍事、法律等各個方面，是宋代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庫。正如眾多專家所指出的那樣，《全宋文》的面世必然對宋代文化研究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，對西夏、遼、金、元文化研究也具有重大意義。以下就以《全宋文》所載宋代《春秋》學文獻為例，略述《全宋文》的學術價值。

一、《全宋文》所收《春秋》學文獻的數量與分類

《全宋文》所收辭賦、詔令、奏議、公牘、書啟、贈序、序跋、論說、雜記、箴銘、頌贊、傳狀、碑誌、哀祭、祈謝等十五類文體中，除箴銘、祈謝兩種外，其他文體中均有《春秋》學文獻。據筆者初步統計，《全宋文》中《春秋》學文獻共有三八八篇，其中第九十冊蘇軾的〈春秋論〉因與蘇轍的相同而存目，第二九六冊蔡沆的〈春秋五論〉五篇為重收²，故實收三八二篇。在這三八二篇中就有一百一十一篇為輯佚所得，占了近三分之一，這充分表明了《全宋文》裒集資料之功。另還有宋人劄記式文章中談及《春秋》學的三十四條，有二條為輯佚所得；策問問及《春秋》學的三十二條。這三八二篇及六十六條文獻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：

（一）序跋類：序跋類《春秋》學文獻除了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序、跋、題識外，刊刻、進呈《春秋》學著作的詔敕、奏議，如第十一冊的宋真宗〈頒行公羊傳敕〉、第一四六冊胡安國的〈進春秋傳表〉以及談及《春秋》學著作刊刻、大意的書信類文章也在內。《全宋文》中共收有這類文章一〇五篇，集外文（別集中無或無文集者）六十一篇，占了百分之五十八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未錄（不算《經義考》不全者）的則有四十四篇，占了近百分之四十二。既是集外文，《經義考》又不錄的則有二十九篇，占了近百分之二十八。

（二）《春秋》總論類：《春秋》總論主要指從總體上討論《春秋》學的奏議、公牘、書啟、贈序、論說等，也有少量的辭賦、傳狀，如第二十四冊宋祁的〈志在春秋賦〉、第一〇一冊陸佃的〈李司理墓誌銘〉。《全宋文》中共有這樣的總論一三七篇，如上述蔡沆的〈春秋五論〉五篇為重收、蘇軾的〈春秋論〉存目外，還有一三一篇，其中二十三篇為集外文，占了百分之十八。另外，劄記有十七

² 蔡沆的〈春秋五論〉與呂大圭的〈春秋五論〉除文字稍有差異外，內容基本相同，從各種文獻記載看，現存〈春秋五論〉當是呂大圭的著作（筆者另有專文考證），所以《全宋文》所收蔡沆〈春秋五論〉為重收。

條，也是總體上討論《春秋》學的。

（三）三《傳》分論類：三《傳》分論是指對《左傳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三《傳》進行專門論述的文章，《全宋文》中專門討論《左傳》（含《國語》）的各類文章有二十九篇（《國語》有八篇），集外文有五篇，討論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的各一篇，其中討論《公羊》的一篇為集外文。

（四）經、傳文論類：經、傳文論是指對《春秋》經文、《左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三《傳》傳文如「桓公不書王」、「趙盾弑其君」之類的具體討論，這樣的文章在《全宋文》中共有八十九篇，八篇為集外文。劄記中也有十七條為經、傳文的討論。

（五）《春秋》廢立類：歷史上有王安石斥《春秋》為「斷爛朝報」的學術公案，王安石、蔡京等執政時也的確不立《春秋》於學官，後人更把王氏不立《春秋》當作了北宋滅亡的原因，宋人時有討論《春秋》廢立之作，故在此把宋代關於科舉考試、進講、立博士的詔令、奏議歸入此類。此類共有二十六篇，十三篇為集外文。

（六）《春秋》策問類：策問一般只是提出問題，不是系統的論述，但從提問中可以了解提問者所關心的問題，故在此將其單獨列類。《全宋文》中的策問眾多，涉及《春秋》學的共有三十二條。

上述《全宋文》中所收《春秋》學文獻的數量與分類，充分地反映了宋代《春秋》學的特點。其一，四庫館臣有「說《春秋》者莫多於兩宋」（《四庫總目提要》卷二十九《日講春秋解義提要》）的說法，表明宋人的《春秋》學著作多，著作多序跋必然也多，故《全宋文》中序跋類文章才會達一〇五篇之多。其二，宋人治學重闡發己意，不泥於古人，故治《春秋》時尊經衡傳，注重對《春秋》經的討論，三《傳》中則對詳於記事的《左傳》研究相對較多，上述《全宋文》中所收《春秋》總論類、三《傳》分論類文獻的數量恰好印證了這一點，這與專著的情況是一樣的。

二、《全宋文》所收《春秋》學文獻的價值

《全宋文》中所收三八二篇、六十六條《春秋》學文獻，尤其是其中的一百一十一篇集外文對宋代《春秋》學文獻、內容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。

（一）文獻學方面：《全宋文》中的一〇五篇序跋類《春秋》學文獻，有四十

四篇為《經義考》無，這可以大大彌補《經義考》在《春秋》學文獻研究方面的不足，促進宋代《春秋》學文獻的研究。

其一，有利於前代《春秋》學文獻在宋代刊刻、流傳方面的研究。如第二九四冊江公亮的〈春秋經傳集解跋〉不見於《經義考》，亦是集外文，跋中指出臨川舊刻《五經》、三《傳》較其他為好，並對自己刊刻的情況做了詳細記錄，顯然這是了解《春秋三傳》在宋刊刻的很好的材料。

其二，有利於對宋人《春秋》學著作的研究。對現存研究較多的宋人《春秋》學著作，《全宋文》可提供新的材料，如孫復的《春秋尊王發微》，歐陽修作孫復墓誌銘中言祖無擇「得其書十五篇」（未言書名），而現傳本只有十二卷，四庫館臣在提要中便據《中興書目》有《春秋總論》三卷斷言是二書加起來共十五卷，學者們視為定論。但據《全宋文》第三十七冊從《宋會要輯稿》中輯得的張方平〈乞甄錄孫復子大年奏〉，明言當時抄得其《春秋尊王發微》二部，並未言及〈春秋至論〉，故四庫館臣的推論值得進一步推敲。而這條材料一直沒有引起學者們的注意。對亡佚的宋人《春秋》學著作，《全宋文》也大有作為。如第二九三冊曹彥約〈跋胡吳春秋答問〉、第三一五冊呂午的〈左氏提綱序〉所載的吳郁問、胡安國答的《春秋答問》、許城的《左氏提綱》二書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經義考》均失收，其他文獻也鮮有記錄，而此二文對二書的情況做了詳細介紹。再如洪皓的《春秋紀詠》，一直以來知其書名，不知其體例，《全宋文》第一七九冊輯得洪皓〈春秋紀詠序〉裏言「經史旁通」、「皆以四句」，使之一目了然。

（二）內容方面：《全宋文》無論對宋代《春秋》學的個案研究，還是專題研究；無論對宋代《春秋》學主流，還是對支流的研究，都有重要的意義。

第一，有利於個案研究。如對北宋《春秋》名家劉敞的研究，有的學者以其《春秋》學專著中不以「夷狄」視吳、楚、徐、越，認為其《春秋》學中的夷夏之別色彩大為淡化，但據《全宋文》第五十九冊所載其文集《公是集》通行本中所不載的〈治戎論〉中卻說夷狄至賤、至亂、至不肖，而中國至貴、至治、至有養，把夷夏之別講到了極點，可見認為劉敞夷夏之別色彩大為淡化的結論是片面的。再如對胡安國的研究，由於他沒有文集傳世，故以往的研究都只注意他《春秋傳》的研究，但《全宋文》第一四六冊輯得其文四卷，其中不乏沒有被研究者注意到的討論《春秋》學的專論，如其〈上欽宗疏〉雖是鼓勵欽宗奮發圖強的勸諫之文，但其主要對「《春秋》大居正」作了討論，其可作為胡氏《春秋》學研究的重要資料。

第二，有利於專題研究。如《春秋》的褒貶是宋人較為關注的問題，對此宋人的觀點大致可分為「有貶無褒」、「有褒有貶」兩大類，在「有褒有貶」中又有「一字褒貶」、「無一字褒貶」等說法，《全宋文》第一九七冊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王之望〈馮奉世、陳湯伐虜予奪不同策〉認為《春秋》「褒人之善，惟恐其不及；貶人之惡，惟恐其或過」，第二一一冊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的李浩〈禮策〉一文，則認為《春秋》褒貶取決於物件是否合禮義，這兩種說法是宋人《春秋》褒貶論中較有特色的，故此二文使宋人《春秋》褒貶觀更為豐富，有利於對這一專題的深入研究。

第三，有利於全面研究。《全宋文》所輯《春秋》總論類文章有二十三篇都為輯佚所得，其對宋代以經為主的《春秋》學主流研究的作用不言而喻，而第七十八冊輯佚而得的李清臣〈春秋論下〉一文，雖是對《公羊》家以「權」解經的批判，卻是宋人少有的專門討論《公羊》學的文章，對宋代《公羊》學的研究彌足珍貴。

綜上所述，《全宋文》所載《春秋》學文獻對宋代《春秋》學的文獻研究、個案研究、專題研究、《公羊》學研究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。當然，這只是《全宋文》推進宋代文化研究的一個小例子，應該說任何宋代文化研究者都可能在《全宋文》中有驚喜的發現。

文以載道，書以紀文 ——《全宋文》與宋代《尚書》學研究

王小紅*

《全宋文》作為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文學總集，彙集了現存兩宋時期所有的文章，可謂研究宋代社會及學術文化的大型資料寶庫。在《全宋文》剛剛出版之後，筆者有幸匆匆探究了這座「文獻富礦」，已經初步領略了這部「宋文淵海」的魅力，現就其中有關《尚書》學的文獻資料，略作評述。

「文以載道」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為文、為學的一個標準，彙總了中國上古

* 王小紅，四川大學古籍所副教授。

「二帝、三王嘉言要道」的《尚書》，不但是「六經之冠冕，百氏之襟袖」，在文學家看來，它就是中國最早的文總集。後世（包括宋代）各類文章，都可以在《尚書》中找到源頭和範本。分析宋人對這部最早的文總集的研究，既可窺見宋代《尚書》學之一隅，也可以為解讀中國現存最大的文總集——《全宋文》提供鑰匙。宋人認為《尚書》是「治道之本」³，「為政之成規，稽古之先務也」⁴。其中的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，皆施政之法則。君主讀《尚書》，以訂治國之方針；學者習《尚書》，可作修身、輔國之用。故宋儒常常為皇帝進講《尚書》，希望能夠「資益聖治」，因此皇帝要「書之以置座右」，「朝夕觀省」，使「聖德日新，比隆堯舜」⁵。這一願望還處處體現於《全宋文》所收錄的十六大文體之中。如其詔令、奏議、公牘、書啟類多引《尚書》以「垂世立教，示人主以軌範」⁶；其序跋類多載宋人對《尚書》學專著的評論；其論說類多有宋人關於《尚書》經義的論說文字；其傳狀、碑誌、哀祭之文還記載了宋人有關《尚書》學的研究和著述情況，足可補歷代書目著錄之闕。所有這些，既是我們研究《尚書》學史的寶貴資料，也是我們認識宋人文體觀的絕好資訊。細審這些資料，其豐富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從前《經義考》、《尚書學史》、《宋代尚書學案》之類專書給我們指示的範圍。

首先，《全宋文》可以大大補充《經義考》及《尚書學史》著錄宋代尚書學文獻之不足。《經義考》和《尚書學史》主要著錄《尚書》學專著，單篇文章鮮少涉及。固然學術專著是經學研究的主要表達形式，研究宋代《尚書》學史首先必須從專著入手。但是，專著多以傳注的方式為解經而作，無論是「我注六經」還是「六經注我」，作者的觀點都大量地分散於對經書的章解句釋之中，資料分散，不易把握。而單篇論文往往是作者最得意的心得所在，綱舉目張，一目了然。專著和專文，正好可以互為補充，相得益彰。因此，研究宋代《尚書》學史，我們主張專

³ 〔宋〕楊萬里：〈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〉，《誠齋集》卷121，收入曾棗莊、劉琳主編：《全宋文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第240冊，卷5364，頁135。

⁴ 〔宋〕司馬光：〈乞講尚書劄子〉，《司馬公文集》卷31，《全宋文》，第55冊，卷1189，頁16。

⁵ 〔宋〕范祖禹：〈進經書要言劄子〉，《范太史集》卷14，《全宋文》，第98冊，卷2129，頁54。

⁶ 〔宋〕文彥博：〈又進尚書二典義劄子〉，《文潞公文集》卷31，《全宋文》，第30冊，卷651，頁298。

著與文章並重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完備無缺，系統全面。況且，對於學術專著，歷代目錄已經反覆著錄，易於查檢，而且層層相因，了無新意。而單篇文章一般只收在文集之中，玉蘊於璞，十分分散，不易蒐集。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，收集單篇論文遠比查檢專書目錄困難。這一點，《全宋文》卻給予了我們更多的方便。

初步翻閱《全宋文》，我們發現一百八十餘位作家，共四百九十餘篇有關《尚書》學的文章⁷，這些大多是從前研究《尚書》學史時注意不夠的。這些文章，從內容上看，主要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宋人「闡發微言大義及疑經惑古」更多的活生生的實例。

宋儒解《尚書》之大義，主要表現在三方面：義理、政事、性理。《全宋文》所載錄的宋代《尚書》學文獻，尤以闡發義理用於政治服務為主，如陳亮〈鄭景望書說序〉記張橫渠之語曰：「《尚書》最難看，難得胸臆如此之大；若祇解文義則不難。自孔安國以下，為之解者殆百餘家，隨文釋義，人有取焉。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，蓋未知其何如也。」⁸時瀾〈增修東萊書說序〉亦云：「唐、虞、三代之氣象，不著於吾心，何以接典、謨、訓、誥之精微？」⁹故宋代皇帝常習《尚書》¹⁰，每令學有成就之講官進講《尚書》，形成了蔚為大觀的《尚書》進講劄子和講義，如文彥博、范純仁、范祖禹、程大昌、徐鹿卿、徐經孫等，這方面的作品非常之多，他們之中有些人雖然沒有現存的《尚書》學專著，但從這些經筵講義，我們卻不難了解他們的《尚書》學思想。

對《尚書》經傳的懷疑，在《全宋文》所收宋人《尚書》學論文中也很多，主要是對《書序》、經文的篇章分合、語句錯簡、今古文問題等進行了專題討論。如朱熹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〉一文，就集中再現了對這些問題的討論，其云：

世傳孔安國〈尚書序〉言伏生口傳《書》二十八篇，……分伏生《書》中四篇為九篇，又增多五篇，〈舜典〉、〈益稷〉、〈盤庚中〉、〈盤庚下〉、〈康王之誥〉，并〈序〉一篇，合之凡五十九篇。及安國作傳，遂引〈序〉

⁷ 若不計《尚書》學特色不太濃厚的群經及人物論類，也有近 400 篇。

⁸ 原載《陳亮集》卷 23，《全宋文》，第 279 冊，卷 6328，頁 264。

⁹ 原載《增修東萊書說》卷首，《全宋文》，第 292 冊，卷 6649，頁 219。

¹⁰ 《全宋文》記載有宋代 12 位皇帝有關《尚書》的詔令文章。

以冠其篇首，而定爲五十八篇。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。然漢儒以伏生之《書》爲今文，而謂安國之《書》爲古文，以今考之，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。……至諸序之文，或頗與經不合，如〈康誥〉、〈酒誥〉、〈梓材〉之類，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，亦皆可疑。獨諸序之本不先經，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。……¹¹

其次，《全宋文》所收文章均注明出處，其中的序跋資料，可以補充《經義考》序跋資料未注來源之憾。《經義考》著錄了大部分宋人的《尚書》學著作目錄、序跋及評論資料，尤其是序跋評論資料，幾乎都沒注明出處，不便讀者覆按原書。而《全宋文》收錄的這些資料，均注明最早的出處與《經義考》的卷數，可以作為《經義考》有關文獻來源之補充。例如，《經義考》卷八十一載錄楊萬里所序羅惟一《尚書集說》云：「楊萬里序略曰……」，顯然只是節選原序的一部分。若讀者想看整個序文，卻因沒有出處，不能快速查找。而《全宋文》所收該序為全文，且明確注明出自「《誠齋集》卷八十二」，由此可補《經義考》該條注述之缺陷。又如，《經義考》卷八十一載王十朋有《尚書解》一書，注云當時「未見」，並著錄了時人的評論資料：「黃淮曰：『梅溪先生以斯道自任，紹興間對策大廷，日盈萬言，援經證據，切中時病。……』何文淵曰：『少時讀王先生注釋……而知先生之學邃於經，宣德庚戌出守溫郡，求得先生文集，而缺注釋經傳之言。』」時人何文淵感歎的「缺注釋經傳之言」，剛好在《全宋文》收錄的王十朋的「策問」中出現了，卷四六三〇〈策問〉一、二、五、六及卷四六三一〈策問〉十一、十二，主要論及〈堯典〉、〈禹貢〉、〈洪範〉、《尚書》流傳及各篇章義理等，這些〈策問〉填補了沒有現存王十朋《尚書》學著作之空白，為我們研究王十朋的《尚書》學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資料。類似的例子在張栻、唐仲友、陳傅良、黃榦、陳文蔚、楊簡等人的文章中還很多。

另外，《全宋文》載錄的宋人《尚書》學文獻，從文體上看，集中在奏議類、論說類、序跋類，而奏議性質的論說類，即經筵講義尤多，約有一半以上的文章屬於此一類，充分展現出《尚書》乃治世之嘉言、人君之軌範的特點。結合文體和主題內容，我們可以把《全宋文》載錄的四九〇篇宋代《尚書》學文獻大致分為總論、單篇論、序跋、詔令奏疏進講教育、人物論、涉及《尚書》的群經總論等六大

¹¹ 原載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 82，《全宋文》，第 251 冊，卷 5628，頁 46-47。

類，其篇數分別為四十三、二六二、七十五、五十五、五十五、十一。由此可見，單篇之論最多，內容主要是對《尚書》中各篇之義理與篇章等的辨析，尤其是文彥博、蘇洵、范純仁、蘇軾、張庭堅、張九成、范浚、王十朋、朱熹、唐仲友、程秘、徐鹿卿、金履祥諸儒，撰有多篇論文論述《尚書》篇章段落詞句，如張九成一人，就有從〈堯典〉至〈秦誓〉共五十八篇論文；而蘇軾、陳瓘、張庭堅等人則有「論視遠惟明聽德惟聰」、「論允執厥中奏」、「論惠迪吉」等多篇短文。宋人闡發《尚書》單篇的義理，對〈洪範〉用力尤多，有近三十餘篇，而其他單篇之論僅有三十餘篇。

至於標題不明顯，而以書信、策問、墓誌銘等形式出現的單篇論文就更多了，這些內容有些很能表達宋人的學術思想。例如，《全宋文》第二四八、二四九冊收錄了朱熹與許多學者、學生的書信，其中與鄭景望、吳晦叔、董叔重、李時可、熊夢兆、陳安卿、潘子善、嚴時亨、蔡仲默、孫季和等人的信中多次談到《尚書》之義理、篇章及治學方法問題。在學界為朱熹沒有《書》解而遺憾的過去和今天，從這些書信中輯出其有關《尚書》的論述，結合其他單篇之作、時人評論資料及《朱子語類》有關之言，可以構成朱子《尚書》學文獻的全部材料，仔細加以研究，可以系統而完整地再現朱子《尚書》學思想。又如，《全宋文》卷五三六四載楊萬里所作〈故工部尚書煥章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〉一文，談到《尚書》名家謝諤《尚書》學思想之一隅：「講《尚書》，因言於上曰：『先儒論學先致知，經者致知之源；帝王之學先稽古，《書》者治道之本。故觀經者當以《書》為本，觀《書》者當證以後世之得失。』上曰：『人君不知學則必至於自怠，如唐太宗，非無功也，而不知學。卿謂讀《書》取證於後世者，甚善。』」在現在蒐集謝諤《尚書》學文獻全缺的情況下¹²，這一條材料是彌足珍貴！

「文以載道，書以紀文」，《全宋文》記載的豐富《尚書》學單篇文獻，為研究宋代的《尚書》學提供了過去難以蒐尋的新材料，也為我們洞悉宋人如何用《尚書》學思想去經世治國打開了方便之門。

¹² 《經義考》卷 81 著錄謝諤《書解》20 卷，云「未見」。其他書錄資料也未見謝氏還有現存《尚書》學著述的。